

## 鲜为人知的中央苏区时期另一个“三人团”

“三人团”组成，进入中央苏区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的形成，与苏区和红军的迅猛发展有着密切关系。1931年2月初，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几次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研究，认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以及改变城市斗争的方式是关系全党的两件大事。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60%的干部要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则90%以上应派到苏区，以充实红军的领导。

2月6日和13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决定了党的领导机关，其中，中央苏区是考虑的重点。此前，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已于1月15日在宁都宣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已决定赴中央苏区工作的任弼时，在政治局会上提议，中央苏区任务重，过去分配的力量不足，如周恩来去苏区有困难，最好另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另外，王稼祥必须去，以利于加强理论工作。周恩来表示准备去苏区，但不能马上成行。苏区中央局成员先定七人——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邓发。8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这一组。

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到职前由项英代理书记。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未到前，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在中央局中起了主导作用。

**如何使用毛泽东分歧很大**  
“三人团”在如何使用毛泽东的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王稼祥积极支持周恩来关于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的建议。在8月上旬于兴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得以恢复。

敬老养老制度在我国有着古老的传统，并一直被社会和官方所称道。先秦以前，就有赐鸠杖及其尊老制度。

西汉建立后，把手杖制成斑鸠式样赐给老年人，这是对养老礼仪的更新和继承，并以法律制度确立下来，成为汉朝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的组成部分。

“杖”古已有之，它还有个雅号叫“扶老”“藜杖”“杖藜”。所谓鸠杖，就是在手杖的扶手上做成一只斑鸠鸟的形状，是王权的象征，后来特指君王赐给高龄老人的“王杖”，成为国家敬老养老的标



苏区时期的顾作霖

众所周知，长征出发前夕，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具有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事实上，在此之前，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当时也被称为“三人团”。

后来部署军事计划时，在后方主持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时与顾作霖和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任、顾不同意前方的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的部署，屡次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给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苏区以直接援助。双方频繁地进行电文往来，各陈利弊，互不相让。最后，焦急与不满交织的任、顾，于9月27日提议在前方召开一次中央局会议。在项英和邓发从闽西返回后，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此之前，中央局后方成员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斗争的程度，而在宁都会议上却展开了一场“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毛泽东尤其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并在会后和周恩来、毛泽东组成了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中央“三人团”。而后来转向支持毛泽东的任弼时，在党的七大后，成为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摘自《党史博览》何立波/文)

意这一提议。

在这次不公正的会议上，王稼祥力排众议，勇敢地站了出来，第一个明确支持毛泽东。他坦率地说：“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非亲非故，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王稼祥从王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是极为难得可贵的。会议最后还是决定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毛泽东因不能取得大家支持，不同意“助理”，于会后去闽西长汀福音医院疗养。

会后，顾作霖和项英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未能将这次斗争展开是调和、模糊了斗争战线”。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四人还联名致电中央，控告周恩来在批评毛泽东时的“温和态度”“在斗争中不坚决”。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免去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迫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

“三人团”中，顾作霖早逝，王稼祥先于任弼时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之处，积极支持毛泽东，尤其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并在会后和周恩来、毛泽东组成了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中央“三人团”。而后来转向支持毛泽东的任弼时，在党的七大后，成为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摘自《党史博览》何立波/文)

## 古代“老年证”

志。

中国人常常以谐音表达思想感情，“鸠”者“九”也，象征极高极深极大极广，又具有吉祥尊荣之意；“鸠”者“久”也，寓意长久持久永久之意。

鸠杖在先秦时期是长者地位的象征，汉代更是以拥有皇帝所赐鸠杖为荣。

汉代是中国古代养老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基于“以孝治天下”的政策，推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那时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不养是重罪。



▲西汉铜鸠杖杖首

汉代战争频繁，为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汉代政府每年会直接给民间老人（庶老）发放食物，如汉文帝刘恒即位当年就下诏：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9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赐帛二匹、絮三斤。

汉代授王杖之事史书记载非常简略。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磨咀子出土的《王杖诏令册》最为完整。这实际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古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不仅有政策法律规定，还有不少量化指标。

(摘自《燕赵都市报》)

## 千里马和大数据

春秋时代有个叫孙阳的人，由于他善于相马，人们便称他为伯乐（天界管理马匹的神仙）。有一天，伯乐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吃力地行走。当伯乐走近时，马突然昂起头大声嘶鸣，伯乐立即判断出这是一匹世间罕见的千里马。

这个故事很可能不仅仅是传说，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伯乐的相马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它在今天可能有一个更时髦的字眼：大数据。

我们先说一个当代伯乐的故事。

2013年的夏天，纽约东部一家公司照例要拍卖一些马，这次拍卖会总共有152匹周岁马要拍卖。在这些马中，有一匹红褐色的马，它比一般的马体型大些，有着黑色的鬃毛，因为它还没有名字，人们便用85号来指代它。

85号的主人是埃及啤酒大亨艾哈迈德·扎耶特，他来到纽约的目的是想卖掉这匹马，同时再买几匹。85号的外观有一些问题，例如它的脚踝处有一些划痕，一些买家担心它可能受过伤。

和所有富有的马主一样，

《后汉书》里马援起家的经历好像一个求职故事。

王莽的新朝到了末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都想争夺天下。马援也在战乱中流离失所，投靠在军阀隗嚣门下。当时，公孙述在蜀地自立为皇帝，隗嚣想去投靠他，但拿不准这个人靠不住得，于是派马援前去考察。马援与公孙述说起来颇有渊源，两人不但是同乡，还是发小。马援本以为公孙述见到老朋友，会像小时候一样亲热地拍拍肩、握握手，跟他寒暄一番，没想到公孙述却摆起了皇帝的架子，他盛陈御林军，召集百官，又命人给马援换好衣服、戴好帽子，才在宗庙中接见了他。整个接见过程非常气派，公孙述拥着皇帝用的銮旗和旄骑。公孙述对马援倒也慷慨，一见面就说要让他做侯大将军。马援的手下听了都很高兴，恨不得当时就留下来。但马援却拒绝了这令人心动的“offer”(邀约函)，回去跟隗嚣汇报说：“公孙述就是个井底之蛙，您再去找找下家吧！”于是，隗嚣又派马援去刘秀那里考察。

刘秀知道马援要来，非常高兴，立刻在宣德殿召见了他，还亲自出来迎接。马援

扎耶特聘请了专家团队来帮助他选马。不过这次他聘请的是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公司的负责人杰夫·塞德不是一个传统的赛马界行家，而是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数据怪才。

塞德的团队仔细研究了所有将要拍卖的马匹，最后给出了一个建议：绝对不能卖掉85号马。塞德说：就算卖掉你的房子，也别卖掉这匹马。85号不但是这次拍卖中最棒的马，还是全年拍卖的一万匹马中最好的，甚至还可能是十年中遇到的最好的马。

在塞德的眼中，85号就是传说中的千里马。

扎耶特听从了塞德的建议，还给85号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美国法老王”。

事实证明塞德没有看错。18个月后，85号成为了30年来首个国际赛马大赛的三冠王。

塞德究竟如何成为当代的伯乐呢？他和传统的相马方式不同，他只对数据感兴趣，他测量了赛马的各种属

性，分析其中哪些与它们的表现相关。

他曾经测量过马的鼻孔大小，给马做心电图，检查它们的心脏，还测量马腿的肌肉体积。总之，塞德对马的一切数据都感兴趣。

那么发现85号是神骏的终极秘密又是什么？塞德并没有隐瞒，他说：如果赛马的左心室越大，它在比赛中的成绩越好。85号马的所有重要器官，包括心脏和脾脏都大得异乎寻常。一匹马如果单左心室很大，其他器官却很小，很可能是患有疾病的征

兆，而85号所有的关键器官都高于平均水平，左心室更是超大，由此塞德断定，85号是数十年难得，百万中挑一的好马。

春秋时期的伯乐可能同样通过类似的数据技术来挑选千里马，而这个大数据就是他的个人经验。伯乐一定观察过成千上万匹马，他一定比较过所有良马的外观、毛色、步态、嘶鸣，各种数据都存在他的心中，所以当他遇到那匹拉盐车的马，看到它的步态、观察它的体型，细听它的嘶鸣，立马和自己记忆中庞大的数据库进行比对，由此断定眼前这匹就是千里马。

(摘自《阅读时代》岑嵘/文)

## 失明四小时

2010年5月，我第二次登珠穆朗玛峰，在峰顶遭遇危险。那次的登顶过程比第一次顺利得多，登顶之后队友们互相拍照，我一闭眼睛，才发现左眼突然什么都看不到了。好在右眼正常。下撤到8100米的突击营地后，我的右眼也什么都看不到了，双目失明。我大喊一声：“我失明了！”

极度的恐惧袭上心头。

突然，身后的队友拍了

拍我的肩膀：“老王，你怎么了？”就是这一拍、一问，让我的恐惧感顿时消失。我平静地回答：“登顶时，一只眼睛失明了，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到了。”队友和大本营取得联系，队医判断，是高山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氧气供应无法满足眼部毛细血管的需要。

队医说，唯一有效的措施是蒙上双眼，不能再让眼睛见光，同时加大氧气供应量，把吸氧量增大4倍，持续吸4个小时，之后就要看运气。

4个小时之后，无论视力是否恢复，都必须下撤。

从突击营地下撤到5号营地的途中，有几个地段需要用到保护绳。如果视力无法恢复，将会非常危险。在那几个地段，我只能一个人沿着保护绳下撤，万一不小心踩空滑坠，靠保护绳挂在悬崖上，双目失明的人是上不去的，因为看不见脚踩的支点。如果到了5号营地还不能恢复视力，再往下撤，途经珠峰南坡绒布冰川地形复杂的冰塔林，安全返回的难度将非常大。

没想到的是，我的内心竟十分平静。集中精力，只做一件事：仔细回忆从突击营地到5号营地的路线。回忆每一个细节，在脑子里一幕一幕地演练，如何让自己安全通过那些危险地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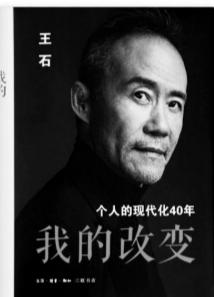
更没想到的是，在生死未卜的情形下，我开始为别人操心。随队摄影师洪海坚持每天在固定时间将攀登过程的影像发回深圳卫视。那天，帐篷外始终静悄悄的，显然他放弃了登顶过程的转播。蒙着眼睛的我摸索到洪海的帐篷，劝他：“再累也要完成今天的转播，如果放弃，你会终生后悔的。”洪海听从劝告，开始操作对接卫星转播的器材。

我想的是，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洪海如果能完成整个攀登过程的现场转播，将创造一项了不起的实况转播纪录。

2003年，我第一次攀登珠峰，现场转播的团队人员近20人，可这次洪海几乎是单打独斗。而且他随队登顶珠峰，实现了高海拔拍摄史的突破。

人类是社会动物，利己是基因本能，利他也是群体生命的本能。此时，这两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4个小时后，拆开遮挡光亮的绷带，我的双眼能看到东西了，朦朦胧胧的。幸运之神给了我一次机会。立即下撤……



王石著  
我的改变

三联书店